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5年1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承当 罗莺 陆懿颖 黄阅月
薛炜 赵秦 范晓峰 于云帆
姜胜 刘英明 邵嘉奇 吴俚君
王曦明 刘晓明 邱艳平 王储

目 录

• 新规速递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3
-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8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本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和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的规定..... 11

• 业务动态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13
- 全面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最高法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18

• 实务研究

- 涉互联网民事纠纷案件中平台责任的主要类型及审理思路 .27
- 王剑平：竞业限制纠纷部分法律问题解析 | 衡石·观点3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25年1月15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f1c5234ac6688dfb149449142d53ab.html>

法释〔2025〕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确认重婚的婚姻无效，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被告以此为由抗辩后一婚姻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条 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权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

（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第五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条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夫妻一方存在前款规定情形，另一方以该方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请求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条 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可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放弃继承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主张另一方放弃继承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放弃继承导致放弃一方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除外。

第十二条 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藏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第十四条 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 (一)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 (二) 有赌博、吸毒等恶习；
- (三) 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
- (四)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 (五) 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第十五条 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又以违反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要、另一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

前款但书规定情形下，另一方以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抚养能力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其他方式作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情形下，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八条 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

第十九条 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第二十条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 离婚诉讼中，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25年1月15日；

信息原网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2751.html>

202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丹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题1：为规制“通过离婚方式意图逃债”行为，此次司法解释是如何规定的呢？

答：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负债的情况下，有的夫妻意图通过离婚方式“金蝉脱壳”，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未负债一方，使负债方的偿债能力降低，损害债权人利益。这种行为是不诚信的，法律坚决予以否定。《解释（二）》明确，如果债务人通过离婚恶意逃债，债权人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分割条款，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会考虑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并非一定均等分割。不能简单以只要不均等分割就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要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司法解释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避免损害夫妻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利益。

问题2：实践中，夫妻双方分居期间或离婚后，一方有采用激烈的、不合理的手段阻止另一方探望孩子，甚至抢夺、隐匿孩子情形，司法解释有哪些回应？

答：民法典第1058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力。《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也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在审理案件中，我们发现，夫妻间矛盾冲突激烈时，有时会失去理智，甚至出现“抢娃”大战。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往往更多关注自己的情感发泄和经济利益得失，而忽略了“角落里”的孩子。法律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基于此，《解释（二）》用三个条文对该行为予以规制：一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二是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请求，在监护权纠纷中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事宜；三是在离婚纠纷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将该行为作为不利因素，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司法审判中，法官一般会通过家事调查、心理评估、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各种情况，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综合各种因素判断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更为适宜，具体考量因素包括子女的个人意愿、年龄、性别、与双方的情感依赖程度、双方经济状况等。

我们要特别强调，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有对父母的依赖和爱，不是可以随意争夺和处分的物品。孩子与父母双方的血缘亲情无法割断，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任何单独的一方或者其他人都不可替代。婚姻破裂，孩子已失去完整的家，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他们不再失去完整的爱。

问题3：在我国，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上述房产该如何分割？

答：子女结婚时由父母出资购房既是我国传统上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同时承载着父母对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期盼，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子女离婚时，父母的希望落空，利益平衡被打破，纠纷也由此产生。《解释（二）》处理该类纠纷的基本原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精神为指导，落实民法典第1062条、1063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范围的规定以及第1087条关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在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同时，注重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肯定和鼓励双方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和第106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除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以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特殊考量，如果婚姻关系解除，父母出资购房的行为基础丧失，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考虑个案情况予以平衡。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夫妻离婚对分割共同财产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其中“财产的具体情况”应当包括出资来源情况。鉴于实际生活中出资来源的复杂性，司法解释区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和部分出资两大类情况分别予以规定：1.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解释（二）》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2.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对房屋均有出资的情况，《解释（二）》规定，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依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因不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比如，双方父母的出资比例为2:8，如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房产归属，具体分割时，一般可以判决房屋归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给另一方20%的补偿，需要在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补偿比例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20%。《解释（二）》引导大家在婚姻中更注重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增强家庭认同感和婚姻凝聚力，既不能让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一方伤心又伤财，也不能让婚姻成为获取不当利益的借口。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本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和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的规定

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24年12月31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bH4pXOBStiyX2iKi3UdoAQ>

为进一步优化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资源配置，更好适应对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司法需求，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现就本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和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管辖作如下调整。

一、原应由上海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下列第一审商事案件，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 （一）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 （二）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外国法院、港澳特别行政区法院、台湾地区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案件；
- （三）涉外、涉港澳台调解协议确认案件；
- （四）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出资、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合并、分立、解散等与该企业有关的商事案件；
- （五）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商事案件。

二、原应由上海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下列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 （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 （二）申请撤销、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
- （三）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外国、港澳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
- （四）仲裁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仲裁调查令的案件。

三、当事人对本市基层人民法院就本规定第一条所列类型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的，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原应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金融法院管辖的本规定第一、第二条所列类型案件，不受本次管辖调整影响。

五、本规定实施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但尚未审结的上述案件，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规定实施前作出的裁判文书写明受诉法院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按裁判文书所载确定受诉法院。

六、本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25年1月15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2761.html>

案例一：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崔某某与陈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崔某某与陈某某（男）于2009年1月登记结婚。2009年2月，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为再婚，与前妻育有一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婚时，陈某15岁，平时住校，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子女。2020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陈某某辩称，因崔某某与其女儿陈某关系紧张，超出其可忍受范围，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某某保管，家庭开销均由陈某某负担，故只同意支付100万元补偿款。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60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以致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与法不悖，予以准许。案涉房屋系陈某某婚前财产，陈某某于婚后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十余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给予方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开销，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酌定给予方补偿对方120万元，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家庭付出的价值，较为合理。

案例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将其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范某某与许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许某某（男）父母全款购买案涉房屋。2020年5月，范某某与许某某登记结婚。2021年8月，许某某父母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范某某、许某某双方名下。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后未生育子女。2024年，因家庭矛盾较大，范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许某某离婚，并平均分割案涉房屋。许某某辩称，同意离婚，但该房屋是其父母全款购买，范某某无权分割。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为3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范某某起诉离婚，许某某同意离婚，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依法准予离婚。关于案涉房屋的分割，虽然该房屋所有权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转移登记至范某某和许某某双方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考虑到该房屋系许某某父母基于范某某与许某某长期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赠与，而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无婚生子女，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故结合赠与目的、出资来源等事实，判决案涉房屋归许某某所有，同时参考房屋市场价格，酌定许某某补偿范某某7万元。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判决该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未孕育共同子女、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酌定出资方子女补偿对方7万元，既保护了父母的合理预期和财产权益，也肯定和鼓励了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利益。

案例三：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

【基本案情】

2015年，颜某某与罗某某（男）登记结婚。2022年7月，颜某某生育双胞胎子女罗大某（男）、罗小某（女）。罗大某、罗小某出生后，与颜某某、罗某某共同生活居住在A省。因家庭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调和，2024年3月，罗某某及其父母、妹妹等人将罗大某强行带离上述住所并带至B省。此后，罗大某与罗某某的父母在B省共同生活居住。经多次沟通，罗某某均拒绝将罗大某送回。颜某某遂提起本案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罗某某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抢夺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权益和父母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颜某某以其对儿子罗大某的监护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并可以参照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因抢夺子女形成的抚养状态，是一种非法的事实状态，不因时间的持续而合法化。该抢夺子女的行为强行改变未成年子女惯常的生活环境和亲人陪伴，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伤害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

【基本案情】

2015年，颜某某与罗某某（男）登记结婚。2022年7月，颜某某生育双胞胎子女罗大某（男）、罗小某（女）。罗大某、罗小某出生后，与颜某某、罗某某共同生活居住在A省。因家庭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调和，2024年3月，罗某某及其父母、妹妹等人将罗大某强行带离上述住所并带至B省。此后，罗大某与罗某某的父母在B省共同生活居住。经多次沟通，罗某某均拒绝将罗大某送回。颜某某遂提起本案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罗某某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抢夺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权益和父母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颜某某以其对儿子罗大某的监护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并可以参照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因抢夺子女形成的抚养状态，是一种非法的事实状态，不因时间的持续而合法化。该抢夺子女的行为强行改变未成年子女惯常的生活环境和亲人陪伴，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伤害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人民法院裁定罗某某自收到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实施抢夺、藏匿子女或擅自将子女带离住所等侵害颜某某监护权的行为。本案裁定发出后，人民法院组织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现场督促罗某某购买车票将罗大某从B省接回A省。

【典型意义】

解决分居状态下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的前提是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可以进行事先预防性保护，避免权利主体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在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人民法院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签发禁令，能够快速让未成年子女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人格权保护事先预防大于事后赔偿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不法行为形成有力的法律震慑。

案例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崔某某与叶某某及高某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崔某某与高某某（男）于2010年2月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某与叶某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于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向叶某某共转账73万元。同期，叶某某向高某某回转17万元，实际收取56万元。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叶某某返还崔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73万元。叶某某辩称，高某某转给其的部分款项已消费，不应返还。高某某认可叶某某的主张。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高某某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某某，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故该行为无效，叶某某应当返还实际收取的款项。对叶某某关于部分款项已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法律对此坚决予以否定。权益受到侵害的夫妻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请求返还全部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因已消费而免除其返还责任。该判决对于贯彻落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和民法典基本原则，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

全面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 最高法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25年1月2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1771.html>

案例一：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法国兰某公司与法国、比利时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某公司）。江某担任上海兰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2017年9月，上海兰某公司与澜某公司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澜某公司对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嘉某公司替代澜某公司进场施工，上海兰某公司向嘉某公司支付装修款1,508,323.50元。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但江某未向上海兰某公司报告该情况。上海兰某公司认为，江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与嘉某公司签订合同，将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装修费用转移至嘉某公司及钟某名下，江某及嘉某公司存在侵占上海兰某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诉请主张赔偿。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本案中，江某系上海兰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兰某公司章程未规定准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江某欲促成嘉某公司与上海兰某公司开展交易，理应基于自身负有的忠实义务，主动向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披露其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并直接控制公司的事实，以便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决定是否同意与其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江某故意隐瞒其与嘉某公司的高度关联关系，代表上海兰某公司与嘉某公司进行交易，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遂判决江某与嘉某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2,861.50元返还给上海兰某公司。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管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管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市场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本案对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管本人扩大解释至高管人员的近亲属或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管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充分认可和体现。

【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初55号

案例二

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韩国T某株式会社系在韩国登记设立的公司，社长为曹某铉。2002年，韩国T某株式会社在江苏省无锡市设立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持有天某公司100%股权。从2018年4月起，韩国T某株式会社通过派员上门、邮寄律师函、发送通知等方式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均被天某公司拒绝。韩国T某株式会社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某公司提供自2006年8月1日起的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以供查阅、复制。天某公司主张，韩国T某株式会社确认曹某铉为社长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曹某铉无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起诉。

【裁判结果】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曹某铉是否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应适用该会社登记地法律即韩国法律进行判断。根据韩国商法的规定，公司应以董事会的决议选任代表公司的董事。韩国T某株式会社章程规定，社长系根据董事会的决定从董事中选任；社长代表本公司。2018年4月17日韩国T某株式会社董事会出席人员符合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确认曹某铉为社长，决议有效。曹某铉亦是韩国T某株式会社商业登记证载明的代表人，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韩国T某株式会社作为天某公司股东的权利问题应适用天某公司登记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韩国T某株式会社行使股东知情权合法有据。该院判决天某公司提供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复制；提供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天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中存在多个法律关系，需要分别确定准据法。法院针对外国法人的诉讼代表权、中国公司的股东权利两个问题分别确定韩国法和中国法为准据法，对案件审理涉及的域外法即韩国法进行了准确查明和适用，确认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社长曹某铉的代表资格；适用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支持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对其投资的天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该案彰显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外国法律解决当事人争议、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理念，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信心。

【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初486号

【二审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160号

案例三

准确判断公司僵局 依法判决解散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基本案情】

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某公司）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艾某公司）持有北京艾某公司90%股权，北京惠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惠某公司）持股10%。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北京惠某公司委派1名，德国艾某公司委派2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由德国艾某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其中至少有双方各自委派的一名董事参加。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等重要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2020年9月15日，北京艾某公司召开线上董事会会议，因不能达成一致，德国艾某公司单方签署《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日，北京惠某公司单方签署《股东会决议》，解除德国艾某公司股东资格。德国艾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及快递方式通知北京艾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查询北京艾某公司财务，快递被拒收，邮件未回复。德国艾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依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下同）第一百八十二条及公司章程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艾某公司经营期间，中外方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为不争的事实，但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不等同于北京艾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北京艾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北京艾某公司董事会仍能有效作出决议，并未落入无法形成有效意思表示的僵局状态，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判决驳回德国艾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德国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机制长期失灵、股东因矛盾激化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按照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只要双方出席的董事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影响公司的运营。自2020年9月15日以来，北京艾某公司长期无法召开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更不能通过董事会解决董事间激烈的矛盾，董事会机制严重失灵，北京艾某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北京艾某公司可以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现北京艾某公司的僵局已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对德国艾某公司要求解散北京艾某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两方股东如仍有意愿，可依据外商投资法重新调整设立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公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典型意义】

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问题，董事会或股东会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公司已经丧失人合性基础时，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运用司法解散的方式来解决公司困境，以避免损害股东利益。本案中，对德国艾某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平等保护理念，结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类公司的特殊组织形式，对司法解散公司的要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合理判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实际运行状态，充分论证了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破解公司僵局的必要性和限度。同时，为引导相关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行为，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还结合外商投资法5年过渡期的规定，指引合作双方可以重新选择合作形式，鼓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实现合作共赢。既有利于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又体现鼓励中外投资主体修复合作关系的价值取向。

【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民初942号

【二审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终596号

案例四

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

【基本案情】

中山市泰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是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以下简称A株式会社）系其唯一股东。松某任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章程》载明，泰某公司股东有权任命和更换董事、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人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2名，由股东委派产生，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2022年4月19日，A株式会社根据其董事会决议作出股东决定，免去松某的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修改《泰某公司章程》中总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条款，改为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事长三某担任。A株式会社随后签署了对松某的董事免职书。同日，泰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免去松某总经理职务。上述泰某公司股东决定、董事会决议作出后，A株式会社派人前往泰某公司就任总经理，并与松某交接工作、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手续。松某拒不移交公司证照，亦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使泰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完成。同时，松某擅自处置转移泰某公司财产，并以泰某公司的名义实施了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泰某公司和A株式会社的利益造成威胁。A株式会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某返还泰某公司证照。期间，A株式会社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在指定期限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证照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根据泰某公司股东A株式会社的决定，松某已不再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总经理职务亦根据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予以免除，其无权在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代表泰某公司签署文件及从事活动，亦无权代表泰某公司保管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账册等资料。

松某拒不执行A株式会社决定及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拒不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并擅自以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一系列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使泰某公司脱离了其唯一股东A株式会社的控制，严重影响了泰某公司的正常经营，如不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将会使A株式会社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该院遂裁定：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三日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该裁定作出后，松某申请复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松某的复议请求，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人民法院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外商独资企业泰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拒绝执行股东决定和董事会决议，并利用登记注册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掌管公司证照的便利，实施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时裁定行为保全措施，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作出一定行为同时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避免了损害进一步扩大，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有效保障了股东对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使，维护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体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

【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一民事裁定、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二民事裁定

案例五

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5年，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公司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山东省设立山东某橡胶公司，中方占股22.98%，日方占股77.02%。合资合同中约定合资公司负责生产并向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即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产品价格由合资公司自主决定；如因产品价格产生争议，中外股东和合资公司三方应协商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该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处理。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认为优某橡胶有限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低价向其母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损害了合资公司利益，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优某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合资公司损失。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案涉合资合同订有仲裁条款，案涉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及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的起诉。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方面，因存在有效仲裁条款，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不得对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另一方面，因日本横某株式会社并非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案涉产品销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起诉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原裁定法律适用错误为由裁定提审该案。再审中，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四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约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本案起诉，各方继续合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准许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从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合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中外双方股东均具有继续合作意愿、各方当事人虽经历一、二审程序但并未实质性解决矛盾等因素，在开庭审理后多次与各方当事人电话沟通，并赴当地召集当事人言调促和，向中外当事人释明我国法律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权益保护、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仲裁协议等相关领域的规定，释法增信、答疑解惑，有效解开当事人心结。最终促使合资公司和中外双方股东以及外方股东的母公司四方当事人圆满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成功和解，以最小成本使得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合资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是司法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

【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2021）鲁07民初718号

【二审案号】（2022）鲁民终1505号

【再审案号】（2024）最高法民再236号

涉互联网民事纠纷案件中平台责任的主要类型及审理思路

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5年1月6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zhxDI50t7cIYIBstwOwLpQ>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电商交易和数字支付提供便捷之余，也产生了大量涉及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平台”）责任的纠纷案件。比如，平台对消费者权益保障承担何种责任、平台未尽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何种责任、平台用工致第三人损害承担何种责任，平台“大数据杀熟”差别定价是否承担责任、平台各类格式条款效力如何认定等司法实务中的常见问题，亟待厘定和研究解决。本文将系统梳理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负有的主要义务和违反义务应承担的责任类型，以及涉平台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等问题，为办理涉平台责任纠纷案件提供裁判思路，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01 平台的主要义务

平台是否承担相关责任，首先要明确平台所具有的法律义务性质。司法实践中，平台主要涉及以下法律义务：

（一）审核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具有信息核验与登记义务，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要审核其提交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同时，对于在平台上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非经营用户，也要进行同样的审核。《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更进一步明确在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经营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平台对经营者资质资格的审核义务主要是针对于其身份资格、营业资格的审查。比如，平台内的商家注册登记进入平台时，应提交其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联系方式等信息供平台审核；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入驻平台时还需提交驾驶证、行驶证、无犯罪记录证明、车辆资料、车辆适驾状况等信息供平台审核；网络餐饮平台还需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可证、线下门店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核；

网络支付平台还需对商户结算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进行审核；网络招聘平台还需对发布招聘信息的用人单位相关行政许可，经办人员的身份证明，求职者的学历证明、工作证明、技能证书、资格证书等信息进行审核。

司法实践中，判断平台是否尽到了审核义务，需要按照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综合各种因素来考量。比如，网络支付平台对商户的审核标准主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等，银行卡实名认证时需要进行动态人脸识别验证。

（二）信息保存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一条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保存时间一般是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一旦侵权行为发生，消费者为维护自身权益需要提供相关证据，平台有义务也有能力协助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相关交易信息。

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信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具有一定的合理使用范围，若在所有情况下均严格适用知情同意原则，可能会导致具体情形下的利益失衡，因此需要结合个人信息的特点与属性、个人信息适用的方式和目的、对各方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为履行合同所必需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比如，平台将送货信息提供给第三方供货公司或快递公司，以完成快递运输服务或退货服务，属于对信息的合理使用；平台运用交易信息，判断是否违反平台规则进行恶意刷单或非正常消费者下单行为，属于合理使用相关信息，不应认定为对个人信息的泄露或侵犯。

（三）告知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条作为一般条款规定，结合该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平台无论是在自营模式下还是非自营模式下，都应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

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与自营模式下平台经营者作为消费者合同当事人的告知义务不同，在非自营模式下，平台不是消费合同当事人，不受消费者合同告知义务的约束，只需要承担平台相应义务即可。

对于告知义务的范围及其欺诈的认定，可将是否对消费者购买决定、购买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等作为判断标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借助生态内形成的“算法权力”，可以精准预测或塑造消费者偏好，因此平台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不能局限于“商品或服务本身”的信息范围，还需要结合在缔约过程中或提供商品、服务过程中的特殊性予以认定告知义务的范围。比如，外卖平台显示的外卖配送时间（由系统历史大数据根据订单配送距离演算出的大致用时）；购物平台显示的满减优惠活动规则、退费承担规则；票务平台显示的航司相关政策、入境签证政策、防疫要求等都会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需要充分告知。

（四）采取必要措施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分别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措施的义务（“红旗原则”和“避风港原则”）。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权的，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接到权利人权利受到侵害要求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中止交易和服务等措施的通知后，平台经营者应及时将通知转送至被投诉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接到被投诉人声明后，应当转送至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未主张的，应及时终止采取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平台是否应采取措施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根据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来判断。具体考量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侵权成立的可能性，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是否存在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的情形，防止损害扩大的有效性，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可能的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类型和技术条件等。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遵循合理审慎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若存在多次、故意侵权行为，可以采取终止交易和服务的措施。当消费者因网络交易中购买或使用的缺陷商品导致其人身、财产遭受实际损害时，平台可依据与商家签署的平台协议规则，在充分考量危险的紧迫性以及协助的必要性后，可采取扣划商家店铺或关联店铺资金向消费者赔付款项、限制店铺资金提现等措施。

（五）安全保障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除对经营者资质资格具有审核义务外，对消费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针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因此其认定标准应高于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且更强调事前预防。司法实践中，可根据平台所采取的预防损害发生的措施作为判断其是否尽最大努力履行了安全保障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尽最大努力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进行审核；尽最大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交易异常信息报告并尽最大努力阻止侵害的发生。尽最大努力的标准需要结合平台的商业模式、经营规模、用户数量、开放程度、当前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定。

02平台的侵权责任

（一）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

间接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有关联，根据法律规定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主要有三类：一是基于帮助行为的连带侵权责任；二是基于管理和控制力的替代侵权责任；三是未履行信息提供义务的先行赔付责任。

1. 平台的连带侵权责任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五条相关责任的规定，在一定情形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要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连带侵权责任要注意以下构成要件：

一是在主观要件方面，平台表现为“明知”或“应知”两种情形。前者是事实上的知晓，比如平台接到消费者举报、投诉或行政部门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向平台经营者发出通知并提供了充分证据，或经营者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等。后者是平台经营者可以显而易见地知道该行为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

未审核平台内店铺类型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和拦截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链接、被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等未履行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的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对于利用自动化算法技术进行算法推荐的侵权行为，需要综合考虑平台是否有人工参与生成或审核、侵权内容是否明显或易于判定、平台的审核技术能力等因素来认定平台是否应当知道侵权内容。

二是在客观要件方面，平台表现为经综合考虑提供服务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样态及时长等因素，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判断平台是否应采取必要措施，一方面，需要审查平台是否恰当审核了权利人的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权利人发出的包含其身份情况、权属凭证、侵权事实初步证据等内容的通知，即属有效通知，平台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涉及专利权的，平台可以要求权利人提供侵权分析报告和技术特征比对说明等材料。另一方面，平台是否采取了删除、屏蔽、断链、停止交易、终止服务等具体措施，且该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止侵权行为、阻止损害结果产生或扩大的实际效果。

2. 平台的替代侵权责任

平台的替代侵权责任主要表现在两类纠纷中：

一类是基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和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关于用人单位和接受劳务一方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主要是平台用工致第三人损害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综合考量。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与平台企业或者用工合作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应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算法控制”优势）、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定、劳动者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予以审慎认定。平台企业或者用工合作单位以要求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合同等的方式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要根据实际履行情况来具体认定劳动关系。总的来说，劳动关系的认定要注重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的核心判断标准。

另一类是基于《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规定是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当平台内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关涉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负有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即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包括进行资质资格审查义务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当第三人行为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侵害，而平台未尽前述义务时，负有替代侵权责任。与帮助侵权责任不同，“知情”并不是替代侵权责任成立的必然要件，“获益”和“控制”是考量要件。“获益”是指，平台须从直接侵权行为中获得利益，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与平台所获得的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控制”则是指平台与直接侵权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即平台有权利和能力监督和管理直接侵权者。在对“获益”要件进行判断时，要注意平台营利模式的隐蔽性特征，不能认为平台经营者“免费”为侵权行为人提供了平台服务就否定获益事实的存在，因为平台可能在对侵权行为人进行价格补贴的同时对另一边用户进行加价，应当综合平台的经营方式、定价策略、价格结构等因素进行判断。另一个要件就是平台对于侵权行为是否具有“控制力”，该控制力通过信息传输通道和介质的技术手段以及制定平台自治规则（如惩罚性违约金）手段存在。

3. 未履行信息提供义务的先行赔付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亦有相关的规定。

平台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主要是基于网络平台对平台内经营主体有一定的控制力，且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可以对平台内风险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预防、化解，对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保障。平台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一般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消费者提供发票、物流信息、支付信息等交易凭证；二是除法定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之外，消费者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三是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二）平台的直接侵权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平台如果利用网络，直接侵害他人的版权、隐私权、名誉权、财产权等，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比如《电子商务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授权的支付造成的损失，由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承担。

实践中，平台的直接侵权责任纠纷多发生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宗旨在于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因此，如前文所述，在合理范围内遵循合理使用规则使用个人信息，不构成对个人信息的泄露或侵犯。同时，实践中，还需要注意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界分。隐私权的保护对象是自然人不愿意被他人所知的信息，而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对象是自然人愿意被他人所知但不愿意被他人滥用的信息，两者进行法律保护的进路完全不同，保护隐私权的目标在于禁止他人侵入及公开隐私，而保护个人信息权的目标在于保护个人的意愿及个人控制自己信息的权利。当然，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私密信息的“隐私权优先适用”规则，将不属于私密信息的个人信息归至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实践中对于个人信息是否构成隐私，需要结合信息内容、处理场景、处理方式等因素，进行符合社会一般合理认知的判断。

此外，还有两类直接侵权行为多发领域值得注意，一类是网络直播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与一般电商平台不同，通常是通过主播粉丝直播打赏的方式与主播直接进行收益分成。当主播直播过程中存在攀爬高空建筑等危险性动作表演时，基于平台与主播分享打赏收益，并对危险动作视频所产生的危害后果有一定的排查和预见能力，能够审查发布者的直播或视频并采取警告、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等适当措施，平台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主播等他人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也可以视为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在网络空间的延展适用。实践中，还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直播平台运营方式、义务承受能力、受害人的过错等，来判断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

另一类是平台个性化定价问题。平台针对不同当事人定制不同价格的行为，常被描述为“大数据杀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对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内容和是否履行的评价标准作出了一般规定。《电子商务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要求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定制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明确要求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条件上实现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算法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信息推送的同时要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的拒绝方式。上述规则为平台个性化定价确定了双重控制标准：一方面要求提供个性化选项，保障消费者能够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交易决策；另一方面不允许平台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但在合理范围内，是允许个性化定价的。实践中，判断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对消费者构成价格欺诈，要注意平台是否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比如是否符合用户实际需求且符合正当的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是否针对新用户在一定合理期限内开展的优惠活动，是否基于平台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规则实施的随机性交易。也就是说，判断的实质是差别待遇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比如，外卖平台根据供需层面的关系，对配送费实施动态定价，且与外卖行业的行业惯例适配，具有合理性；票务平台受市场供求因素等影响，显示的不同时段的机票价格存在浮动，符合交易惯例和公众认知，具有合理性。

03 平台的涉合同责任

网络服务合同是平台与消费者或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较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实践中常见纠纷是对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比如平台单方变更权效力的认定、限制性条款效力的认定、惩罚性违约金条款效力的认定等。

关于平台单方变更权效力认定问题，大多数平台都会在其与用户之间的平台服务合同中引入单方变更条款，比如规定平台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变化及维护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需要，修改、补充协议内容，如用户不同意变更事项，应于生效之日起停止使用平台服务，如继续使用，视为同意。此类变更条款由于未明确约定单方变更的条件和变更的内容，未对单方变更作出限制，属于空白条款。实践中，应遵循公开、连续、合理的原则，若平台方确有单方变更的需求，可认定变更条款的效力，但其变更内容应受到限制。要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二、三款关于格式条款特有的无效情形的规定，判断单方变更条款是否有效，判断其是否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同时，空白条款属于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

关于平台限制性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平台为了维护正常的网络运营秩序，在服务合同中常会设定一些限制性条款，比如设置网络购物禁止异常交易行为条款，以防范商户、黄牛、不良商贩以抢购、刷单等非正常手段破坏、扰乱正常经营秩序，影响正常消费者的购买机会；设置网络游戏限制虚拟财产交易条款，以维护游戏公平环境，保障其他玩家获取公平竞争机会；设置禁止经营者转让非独立网店条款，以维护网店信用评价制度和实名认证体系，保障消费者权益等。如果限制性条款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过双方合意，当属合法有效。司法实践中，在判断是否属于异常交易行为时，需要注意审查平台是否进行了合理甄别，是否在综合考量购买商品的种类、数量、频次、时间、物流情况、IP地址等因素后，认定为异常交易行为采取限制措施。在判断网络游戏限制虚拟财产交易条款效力时，需要注意如果限制条款本身与游戏设置相矛盾，平台拥有可以通过修改游戏软件设置限制游戏方式的技术，则游戏玩家对游戏方式的选择应仅受游戏规则而非限制条款的限制，不能通过限制条款将玩家在游戏规则允许范围内操作游戏的行为认定为违约，技术因素需要纳入网络游戏限制条款效力判断的范畴。

关于惩罚性违约金条款的效力问题，平台在服务合同中设定限制条款的同时，往往会约定违约金条款，不同于普通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平台为了履行自身所承担的平台管理责任，防范和治理商家的恶意违约行为，特别是为了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防范虚假交易刷单套利、商品类目违规套取补贴等，为了维护平台正当商业信誉、正常交易秩序、消费安全、保护其他经营商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平等的基础上通常会与入驻其平台经营的商家达成的带有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条款，其一般具有法律效力。

但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违约金条款属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条款，又往往订入格式合同中，因此平台要采取合理方式提醒对方注意相关条款的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加粗、下划线方式提醒商家要着重阅读、慎重思考；就违约金责任专门签署特别的承诺书等，以让商家充分意识到并且确认愿意接受这种特殊违约金的条款安排。关于是否认定违约金数额过高予以适当酌减的问题，由于平台不具有行政执法意义上的罚款权，因此平台语境下的违约金制度仍然要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以填补损失为原则。

当然同时也需要考虑平台的特殊性，尊重平台治理规则，以实现良好的平台自治效果。因此，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平台商业信誉的损害程度、可能遭受的权利人的追责、平台为了约束相关违约行为而支出的各种管理成本、平台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而作出的提前赔付、商家违约时的主观状态等因素，使平台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在大致上与商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相匹配，准确合理地适用司法酌减，在充分尊重平台自治、维护自治规则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同时，又避免这类条款成为平台对商家“薅羊毛”、非法获利的借口。

结语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司法治理，深化数字司法实践，完善涉数字经济案件规则提炼指引。涉平台经营者法定义务及相关主体权益保护的案件日益成为一类新型多发案件。审理此类纠纷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鼓励创新、规范引领的功能作用，处理好平台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衡平，既要注重保障平台自治管理权，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又要注重对相关主体权益的保护，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救济。

王剑平：竞业限制纠纷部分法律问题解析 | 衡石·观点

来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5年1月13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0f2VgHG0WdfScRKEw1BV5g>

竞业限制是指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基于与原用人单位的约定，在离职后的一定期间内，在一定范围不得从事与原用人单位营业相同、类似或与原用人单位的营业存在竞争性的行为。竞业限制违约金是指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竞业限制违约金纠纷，事关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权益和劳动者的再就业权利，如何在实践中把握，争议很大，因此、有必要讨论竞业限制违约金的具体应用与规则。

Part 1 案例选编

01 涉及负有保密义务人员的认定

何某、A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双方签署《雇员保密协议》载明：何某在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一年内，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自营或为他人经营竞争业务，不与任一公司客户或公司关联方客户签订聘用合同、顾问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可得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金为月基本工资的50%；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竞业限制期间的经济补偿金总额的五倍。

四日后，何某在员工微信群中明确系涉及工作收入的问题，不得已被动签署该协议；不认可该协议的签署，声明作废。五个月后何某从该公司离职，公司通过转账向其支付2500元竞业限制补偿金，何某予以退还。此后何某在其他公司从事与其在A公司相类似工作，A公司遂以何某违反竞业限制为由起诉要求何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何某则以其仅是一线装运维人员，并无需要保密内容作为抗辩。

一审法院认为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何某作为装运维人员难以认定系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然其作为一线业务人员对基于工作原因所知晓的A公司业务内容必然具有保密义务，双方进行竞业限制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A公司在何某离职时亦明确告知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并支付了首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何某应当按约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故一审法院判令何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万元。何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违约金的，首先应当证明何某属于竞业限制适格主体。何某在A公司从事宽带装运维工作，且担任组长一职，并无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技能证书，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何某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则A公司须举证何某系“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A公司并未能举出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何某属于竞业限制义务适格主体，实际是将竞业限制协议扩大适用于普通劳动者，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二审法院改判驳回了A公司的诉请。

02 涉及企业竞争关系的认定

王某于2018年7月入职B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协议。2020年7月，王某因个人原因解除与B公司的劳动合同。B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020年10月发函要求王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王某于2020年8月入职C公司。

2020年11月，B公司以王某入职竞争关系企业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某依约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2021年2月，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某支付B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王某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不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B公司与C公司的经营范围来看，两家公司均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属于竞争企业。王某在两家公司处所从事的均系计算机领域内相关岗位，存在利用其在B公司处掌握的商业秘密侵害其竞争优势的潜在可能。故王某自B公司处离职后与C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有违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王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B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C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对比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确实存在一定的重合。但B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其主要的受众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学术研究机构。而C公司主营业务是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即提供网络空间供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交流。

故二审法院认为，两公司不论是经营模式、对应市场还是受众，都存在显著差别，且提供金融信息服务与提供网络空间供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交流并不重叠。尚无证据显示C公司经营业务与B公司经营的金融信息服务存在重合之处。且B公司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所附录的重点限制企业均为金融信息行业，足以表明B公司自己也认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应为金融信息服务企业。据此，一审法院仅以B公司与C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认定王某入职C公司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继而判决王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有欠妥当。二审法院遂作出改判，王某不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03 涉及竞业限制违约金数额的调整

黄某与D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协议，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该竞业限制协议约定，黄某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一年内，均不得为公司的任何竞争者工作或提供服务，不得从事与D公司业务直接竞争的任何经营业务或经营活动。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标准为黄某离职当月工资的30%。黄某如违反竞业限制协议，除退回经济补偿金外，还应支付100万元违约金。黄某共领取竞业限补偿金1.5万元。竞业限制期内，黄某进入与D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E公司工作。D公司发现后要求黄某支付违约金100万元。黄某答辩中认为违约金过高，即使要支付违约金也应当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认为

黄某与D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黄某离职后进入的E公司系与D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并有一定竞争关系的企业，其行为违反了双方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故黄某应当返还D公司已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外，还应支付违约金。一审判决黄某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1.5万元，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违约金100万元。黄某不服，提起上诉，要求判令其不支付违约金，不返还补偿金。

二审法院认为

黄某能够接触到公司商业秘密，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黄某与D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黄某离职后在E公司工作，该公司系与D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并有一定竞争关系的企业。黄某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故应当返还D公司部分竞业限制补偿金外，还应支付违约金。但由于黄某在竞业限制期间取得的补偿共计1.5万元，但违约金高达100万元，结合李某的工作年限、职务及D公司是否有实际损失等因素，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违约金过高，应进行适当调整，法院遂判决黄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

Part 2 衡石观点

认定竞业限制人员可参照商业秘密的构成论证其是否属于保密人员

违反竞业限制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存有商业秘密，劳动者负有保密义务。在竞业限制违约金纠纷中，一般情况都是用人单位以双方签有竞业限制协议为由主张竞业限制违约金。那么，基于劳动者签订保密协议的事实，是否可以直接推定劳动者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基于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分析认定劳动者可以接触到公司的商业秘密，是否可以直接认定劳动者属于竞业限制人员？这其中涉及竞业限制的保护对象即商业秘密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实践中关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三个判断标准：一是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这是商业秘密最核心的特征，是商业秘密维系其经济价值和法律保护必要性的前提条件。二是价值性，即商业秘密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商业秘密的经济性也是保护商业秘密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商业秘密能够给人带来经济利益，才会出现商业秘密的侵占和争夺。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其重要目的也在于维护权利人经济上的利益。三是保密性，即权利人主动对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采用保密技术、运用适当的保密设施装置以及采用其他合理的保护方法。

对于竞业限制人员的审查认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研发人员往往能够全面、完整的接触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此类人员如果到竞争对手处工作将会对原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员工也负有保密义务，他们因工作原因可能会接触到单位的商业秘密，这类人员也应受到竞业限制的约束。对于其他虽在用人单位工作，但不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到新的用人单位工作的，不应将其列为竞业限制的对象。

因此，不能简单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签有保密协议的事实，直接推定劳动者为负有保护商业秘密义务的人员、属于竞业限制人员，而是应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中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遵循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存有商业秘密，劳动者是否能够接触到公司的商业秘密，来认定劳动者是否属于竞业限制人员。

案例一中，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是否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即从商业秘密构成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何某接触到的并非竞业限制所要保护的商业秘密之结论，进而认定何某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此，竞业限制协议不能限制非负有保密义务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用人单位不区分劳动者是否掌握本单位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保密事项的人员，无差别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约定高额违约金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离职后进入有竞争关系的新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高额违约金的，依法不予支持。

02 认定竞争关系企业应结合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产品受众及市场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置系为了防止劳动者利用其所掌握的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为自己或为他人谋利，从而抢占了原用人单位的市场份额，给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因此，考量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关键在于审查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营或者入职的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

对此，就行业或者专业领域的限制，首先应当重点考虑新用人单位是否与原用人单位构成事实上的竞争，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围就是竞业限制的限制就业范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也日益多元化、规模化，一个企业的经营有可能涉及不同行业或者各个领域。而实践中往往还存在企业登记经营事项和实际经营事项不相一致的情形，加之经营范围登记类别是工商部门划分的大类，所以这种竞争关系的审查，如果仅限于将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围作为竞业限制的限制就业范围，则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生存和就业，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劳动者的限制就业范围，应当考虑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接触或者可能接触到的商业秘密范围，其限制就业的范围即应当和他所知悉的或者掌握的商业秘密范围相适应，而不应当扩大到整个行业或者领域。

对行业或者专业领域范围的限制，其次应当限于用人单位的核心竞争业务领域。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竞业限制协议时，并不应泛泛地规定本行业或者其他相关行业，而是应当具体规定什么行业、什么业务领域、什么企业。在竞业限制协议订立时，应当让劳动者清楚地知悉自己签订此协议以后，再次就业时将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因此，在审查劳动者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劳动者自营或入职公司与原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企业经营范围重合，并不意味着一定构成竞争关系。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了竞争关系的企业，但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并不取决于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而应当取决于是否真实存在竞争关系。这是认定劳动者是否存在竞业限制的重要条件，因此一定要对相关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

案例二中，法院在审查劳动者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时，不仅从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进行认定，还结合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进行综合判断。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的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不同，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3竞业限制违约金数额可综合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劳动者受益及过错、单位损失等因素酌情调整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可能因劳动者的竞业行为遭受侵害而造成利益损失，因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会事先协商签订竞业限制违约金条款，通常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人民法院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不宜进行过度干预。

但是，《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或者低于实际损失，当事人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当前，《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基本沿袭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内容，劳动者得以据此主张调整违约金。

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违约金畸高的，当事人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适当分配举证责任，要求用人单位对违约金约定数额的合理性以及特定商业秘密的经济价值进行举证。

在实践中违约金条款的审查及违约金数额的调整，可酌情考量以下因素：竞业限制协议签订的时间、劳动者原职务、收入情况、劳动者违约的过错程度、未履行期限、补偿金是否支付以及支付的数额、用人单位的实际损失等。法院应当秉承谦抑原则，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调整约定违约金。

案例三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竞业限制违约金、经济补偿明显不对等，劳动者主张减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希望大家能够对竞业限制纠纷的部分审理规则有一定清晰的认识。审理此类纠纷，要在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合法利益的同时，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也不能不合理限制市场人才正当流动。在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和择业自由权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间寻求利益平衡。注重发挥审判的价值引导作用，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合法权益的良好法治营商环境。